

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

陳新
旭知

2233

1

B038

23

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

陳旭麓 著

新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

陳旭麓 著

*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3/8 字數：24,000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1,000本

書號：新063 定價1,500元

前言

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是近年來歷史教學中普遍感到的困難問題之一，自己也經常遇着這樣的困難。通過教和學，積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先後寫成下面的三篇文章，曾在報刊上發表過，現在經修改後把它們放在一道印出來，這只能說是對這一問題的點滴體會，不敢說有何參考價值，并在這裏誠懇地向大家請教，希望有得到糾正錯誤和提高認識的機會。

作者記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目 錄

評價歷史人物與歷史教學·····	五
論歷史人物及其階級·····	九
評價歷史人物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三

評價歷史人物與歷史教學

過去對歷史人物的評論，並不構成一個什麼問題，只要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大發議論。作一篇「秦始皇論」，你可以恭維他雄才大略，也可以罵他窮兵黷武，殘民以逞。這裏正如買辦階級知識分子胡適所說的：歷史好像百個大錢，你愛怎樣擺就怎樣擺；把歷史看成了隨意拼湊的七巧板，歷史人物的是非功罪也就只憑自己的好惡下筆，甚至爲了標新立異可以完全抹煞甚至歪曲事實。可是我們今天完全不是這樣，我們評論歷史人物，自有一定的「故」和一定的「理」，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故」和「理」。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法則來進行具體分析，除了有些因資料缺失外，我們認爲一切歷史人物都可以得到一致的認識。也正因爲這樣，正確地估價一個歷史人物，也就成爲我們今天歷史教學上的一個問題。

解放後，有人說：「我們的革命事業是翻天覆地的，對歷史人物也來一個翻天覆地就成了。凡是過去指爲好的，你就說壞；反過來，過去所指爲壞的，你就說好。」有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固然如此，但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因爲歷史不能割斷來看，文

化的傳統性是不可忽視的。過去大家都說夏桀殷紂的「荒淫無恥」「暴虐無道」，今天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說他們很好，顯然是不可以的。過去沒有不尊孔子爲「大聖人」的，今天我們是不是就說他壞到透頂，顯然也是不可以的。正如恩格斯所說的：「要不是這樣，那麼，把理論應用到隨便一個歷史時代裏，都會要比解決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迂迴曲折的，歷史人物的活動是不能離開錯綜複雜、迂迴曲折的歷史背景的。因此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可能把它簡單化，尤其是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沒有解決的問題還很多，這些問題也同樣存在於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我們在評論歷史人物時，經常碰到困難，這都是由於我們不能正確認識下列那些複雜的歷史現象：

- 一、開始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後來成爲了專制皇帝，一個人從反皇帝到做皇帝構成兩個不同的形象。

- 二、在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交叉中，許多歷史人物爲了抵抗外族的入侵，貢獻出自己的生命，可是他又鎮壓過農民起義。

- 三、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非常複雜，侵略與抵抗的界限很難劃分清楚。由於戰爭

①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論的信，學習雜誌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一六頁。

性質（正義與非正義）的不明確，以致處理主持或參預這些戰爭的歷史人物成了極大的困難。

四、統一與衛國的矛盾。就統一方面說，有着社會經濟的必然要求；就衛國一方面來說，又有抵抗暴力的意義。

這些複雜的歷史現象，是通過無數歷史人物的活動表現出來的，因此，我們也就不易評價參加這些複雜歷史活動的歷史人物的是非功罪了。稽文甫先生在新史學通訊中曾有一文分析到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可見我們的歷史教學在這方面存在的困難很大。現在我們雖然已經基本上使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在評價歷史人物，但是如何掌握原則進行具體分析，是解決這些複雜問題的唯一方式。我們不可能設想：民族英雄就只是民族英雄，專制帝王就只是專制帝王，好像除此以外就不應再有什麼了；事實上在他們一生的活動中常常是曲折而複雜的，這正是客觀歷史反映的必然現象。茲就個人從教與學中的點滴體會分述如下：

第一、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評價歷史人物，不要以今天社會發展的條件來衡量歷史人物。斯大林說：「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爲轉移。」^①這個原則同樣可以使

①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二頁。

用於評價歷史人物。如果我們以今天所達到的社會生產和政治文化的水準去要求歷史人物，不但歷史上找不着好人，而且也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就是把我們所處的新社會與歷史人物所處的社會等量齊觀，這是非歷史唯物主義的。

究竟要怎樣我們才不是以今天的條件去衡量歷史人物呢？例如我們評論康有爲與梁啟超在戊戌維新運動中沒有反帝反封建的明朗態度，因而就抹煞他們在這一運動中從愛國出發和對保守、落後勢力鬥爭的進步作用，這樣顯然是超越時代的要求。我們知道反帝反封建是在戊戌維新二十餘年後的五四運動時才具體地提出來的。雖然時間的距離不算太長，可是這二十幾年中世界和中國的變化都很大，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又如我們如果以五四運動開始的現實主義文藝作品的方向，去要求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所產生的紅樓夢，因而抹煞曹雪芹這一偉大作品的現實主義的豐富內容，即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惡和顯示封建制度形將崩潰的徵兆的意義，這樣，必然就會犯不可寬恕的錯誤。

那末又怎樣以歷史人物所處時代的條件去要求歷史人物？例如我們在一九五一年所展開的「武訓問題」的批判，有些人認爲對「武訓不參加農民革命、而後來反做了統治階級的幫閒」的批判，是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要求武訓，我想一點也不是，因爲武訓

出身於農民階級，就他所處的歷史時代來說，有太平天国、捻軍等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而且當時宋景詩還起義於他的家鄉。武訓既不同於千萬萬勞動人民的終年辛勤於勞動生產，又不是走同時代勞動人民的革命道路，却逐漸走向反動統治集團，穿上了「黃馬褂」，被稱爲「聖人」，從滿清王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的軍閥官僚都在表揚他的奴隸行動。又如我曾在教學中批判石達開沒有從太平天国革命的整體利益出發，却個人主義的別樹一幟，分散了革命力量，以致被敵人各個擊破。有些同學覺得這樣批判、對石達開要求太高，認爲當時石達開的所以離開南京，是完全出於不得已。當然，洪氏集團對他的猜忌、排擠要負很大的責任，但是要求石達開從革命的整體出發來挽救太平天国的危亡，是沒有違背歷史條件的，如後來李秀成就始終堅持不渝的爲革命整體利益打算，革命雖然仍是失敗了，然而這種從整體出發的革命精神，是我們不可否認的，石達開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是石達開的錯誤。

本來我們根據歷史條件來評判歷史人物，不是從當時所處的環境來原諒歷史人物。事實上在任何歷史時代，都有進步的和落後的、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個方面，我們必須是從進步的、正義的來要求歷史人物，愛國詩人陸放翁曾有句道：「萬事不如公論久」，這種「公論」往往就是屬於進步的、正義的一邊。如果就落後的、非正義的方面來衡量歷

史人物，那對反革命分子也可以加以原諒，對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也變得寬宏了。

第二、對歷史社會起了推動進步的作用還是起了阻礙破壞的作用？這個原則不但是評判歷史人物的標準，同時也是我們自己處理事物的標準。但是在我們自己處處的今天，誰進步，誰落後；哪些事物屬於正義，哪些事物屬於非正義，我們容易了然。至於歷史人物，離我們的時代遠，他們所處的時代也不同。我們今天已經掌握了歷史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這些客觀法則已成爲我們的指導思想，誰不能接受這個指導思想或違背了這個指導思想，是很明確的。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他們不可能掌握客觀法則。因此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是推動還是阻礙，就不是那樣一目了然，需要掌握材料具體分析。

歷史的發展是錯綜複雜的，任何時代的社會矛盾也是多方面的，許多人和事都包含着進步與落後，在同時期裏的一個歷史人物，也常常是兩個方面的活動者。從不同的角度去評價他，對同一個歷史人物常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前些時候，有些人說岳飛的死，是忠於階級不是忠於民族，不但不能稱爲民族英雄，還有鎮壓農民起義的反革命罪惡。史可法也是如此。這樣的評價岳飛與史可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是我認爲應該從其主要的一面去看：在岳飛所處的南宋時代，史可法所處的明末時代，民族矛盾超

過了階級矛盾，他們的犧牲是爲了對抗外來的侵略，這是其主要的一面。雖然他們還是爲維護宋代與明代的統治，可是他們不可能爲一個人民政權服務！好像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一直是做滿清的大官，從來就沒有反抗滿清統治的意願，而且洪秀全在金田起義的時候，他曾奉命爲欽差大臣，要去剿滅這支剛起義的農民軍，不過他才到半路在潮州就死去了，這樣說來，林則徐又何嘗好！可是我們對他是絕對肯定的，因爲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林則徐不但積極禁煙，而且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這在林則徐的生命史上，是其最主要的一面，雖然他的禁煙與抗英活動只有幾年。如果我們分出主要與次要的兩個方面來，對任何歷史人物也就不易得到正確的評價。並且那些罪惡如山的壞人，如果做過一點差強人意的小事，你也會一葉遮目把他說成好人。如左宗棠的開發新疆，在一定時期內也發生過防止帝俄勢力向新疆的擴張，但是他的一生却是鎮壓太平天国革命和回民起義，勾結英法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

青年同學們常常希望我們用「好」和「不好」，以極簡單的語句來決定一個歷史人物的一生，可是有些歷史人物我們就不可能以推動歷史或阻礙歷史的公式來概括他的一生。因爲他前後的活動常常是不一樣的。例如康有爲在戊戌維新時期，他倡導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運動，是有進步意義的，到了戊戌維新以後，中國已進行革命，他還要「保皇」和

「復辟」，這顯然是落後甚至反動了。我們對這樣的歷史人物就要根據前後兩個不同階段說明其推動歷史與阻礙歷史的關係，正可啓發青年要跟着時代跑，對新興的事物要有敏感，否則今天你是進步，明天你就可能變爲歷史的絆腳石。這裏我說明對某些歷史人物的不同階段，應分別對待。就是有些農民起義的領袖，如朱元璋，後來做了皇帝，成爲了封建專制的統治者，我也想應該從前後兩個時期加以說明，不能因他做了皇帝而抹煞其農民起義的功蹟，同時農民起義推翻了舊王朝，難道他能建立一個離開封建社會的政權嗎？那就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恰如自己的手握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因此他做了皇帝以後，我們又要看他有沒有做過一些推動社會生產的工作，如果做過一些推動社會生產的工作，我們就得從這些工作予以肯定，就是漢武帝的開發西域，唐太宗的對外用兵以及溝通中印文化，也不能說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發展沒有起過積極作用。

某一個歷史事件的本身自有進步意義，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然而參加這個歷史事件的人物，不一定就都是進步的正義的。例如創建同盟會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與黃興是並稱爲革命偉人的，可是黃興是同盟會的「右派」，辛亥革命後又處處不能與孫中山的行動合拍，影響革命的推進甚大，我們雖然可肯定他在革命中的某些功績，但是他的思想

行動却便利了反革命的進攻。又如討袁之役的護國戰爭，蔡鐸和梁啟超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我們對蔡鐸可以肯定，對梁啟超就不一定是肯定了，因為我們要聯系其他方面來看。蔡鐸從辛亥革命到護國戰爭，他不是走的當時許多軍閥的行徑，而護國戰爭又是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動，我們今天可以尊之爲蔡松坡將軍；梁啟超就不同了，辛亥革命後，他看到無「皇」可「保」了，從國外回來，投降袁世凱，組織什麼「進步黨」，實際他早已不進步了。在護國戰爭之後，又長期依靠軍閥做「有槍階級」的尾巴，完全成了政客。政客生活變成了他主要的一面，至於他在文化方面的貢獻，又當別論，因此我們評判一個歷史人物還要從他的各方面有聯系地來研究。

第三、明確立場，對誰有利。首先在這裏應該說明一個問題，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是站在歷史人物的立場，還是站在我們今天的立場。前面已經說到，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社會條件去衡量歷史人物，自然也不能以我們今天這樣鮮明的立場來要求歷史人物，那末我們是不是以歷史人物的立場去評價歷史人物？例如秦代統一六國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但是抵抗秦國的六國人物，如信陵君、廉頗、藺相如等，是不是就都爲阻礙歷史發展的罪人；而努力於爲楚聯齊以抗秦的屈原，是不是就不能稱爲愛國詩人？有人說看你站在秦的立場還是站在六國的立場，我認爲我們不應站在六國的立場，也不應站在秦的

立場，而是站在看他們的行動是否對當時人民有利的立場。秦國的統一六國是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是大家公認的，然而秦的統一是暴力的，當然我們不可能希望在一千二百年前的秦能用「和平解放」或「加盟」的辦法來統一六國。既然秦是用暴力征服，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六國不進行抵抗而望風投降呢！又有什麼理由說屈原「出國而軫懷兮」的那種愛國熱情是錯誤的呢！歷史事件是複雜的、矛盾的，我們不能機械地只顧到統一的一面而取消了另外的一面，因為二千餘年前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他們沒有方法能認識社會客觀規律的發展。我們不可能以今例古的要求他們「一邊倒」。至於屈原，有些人愛做翻案文章，總是想否定屈原的文學作品，或者說屈原的楚辭在文學上有價值，在政治上却是落後的（抵抗秦的統一）。我認為屈原值得歌頌的地方：（一）他眼見楚國在強秦的進攻下，有滅亡的危險，不願妥協投降極力主張聯齊以抗秦。（二）他不願與小人同流合污，他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三）由於他有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政治情感，所以能寫出楚辭這樣的偉大作品。

歷史人物在他自己所處的歷史時代中，他的所作所為給予當時的人民和後世的人民是否有利，這就是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立場。例如雷以誠的創辦釐金制度，給滿清政府解決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反動武裝的軍餉，對人民和人民革命事業是有害的。武訓的

行乞興學，並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好處，只是多製造了一批爲統治階級服務的人物。如他們的這種行動只有利於統治階級，當然我們是絕對否定的。反過來我們看看這件事：莫斯科大学大禮堂的走廊上鑲嵌着各國科學家的彩色大理石像，其中有我國的歷史人物祖冲之和李時珍。前者對數學機械學有着創造性的成就，後者對藥理學植物學有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的成就和貢獻，對於當時和後世的人民都很有利，所以蘇聯朋友這樣的推崇他們。

在封建專制社會裏，許多歷史人物的行爲，是不可能離開封建政權的關係的，也不可能要他們的政治動機不從他們的政權出發，否則倒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因此我們就得看通過他們的政權的那些行動，對人民是否有些好處，如果有的話，我們就得從這一方面來估價。例如漢武帝的對匈奴用兵，初期是起於防禦，後來轉爲進攻，這種進攻何嘗不是爲防止匈奴的再入侵，當然無論防禦與進攻，不可否認，他是從鞏固自己的政權出發的。可是因漢武帝的對匈奴用兵，不但給當時解除了匈奴的繼續入侵，而且開發了中西交通，起了文物交流的作用。又如秦始皇的築長城，隋煬帝的開運河，奴役了千百萬勞動人民，何嘗不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統治和享樂，然而長城發揮過防禦外族侵凌的作用，相對地保障了當時人民的生命財產；運河的開發便利了南北的交通，在客觀上都有益於人民，而且是我們今天貫徹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教材。雖然秦始皇、漢武帝都是歷

迫人民的專制帝王（至於隋煬帝更不消說了），可是我們不能因他們是專制帝王就抹煞這些客觀上的成就，事實上這些成就正是千萬勞動人民創造的成果，不過通過了當時的上層建築而開展的建設罷了。彼得大帝是一個專制帝王，他到國外努力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工業，對俄國社會起了推動進步的作用，對人民有利，蘇聯到今天還是稱道他。自然，我們也不能因為某些有益於人民的客觀效果，而原諒其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本質。斯大林就這樣的說過：「彼得大帝爲了提拔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起的商人階級，曾經做過很多事情。彼得大帝爲了建立和鞏固地主與商人底民族國家，曾經做過很多事情。同樣也應該說：提拔地主階級，幫助新起的商人階級以及鞏固這兩個階級底民族國家，是靠拚命剝削農奴來進行的。」①

評判歷史人物的這些原則，我們是容易理解的。問題是如何使用原則具體的分析歷史人物，上面我所舉出的一些史例，都是大家在歷史教學中經常所碰到的問題，當然這些問題尚有待於進一步的討論和研究。

從教學作用和正確認識出發，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判，應該是嚴肅的，是實事求是的，不能憑主觀片面的臆斷。例如對武則天的看法，過去都罵她淫蕩，簡直是一個爛污

① 斯大林：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頁。